

政策的外交文件也是很籠統，我們沒法知道牠們的真正意義。例如，美國歷來在遠東方面所宣布的門戶開放政策，現在時勢遷變，我們已不知牠的意義是什麼。其他如飛機的地位，國際法上尚沒有正式規定，將來戰爭發生，飛機的重要性必定比大戰時的潛水艇還要利害好幾倍，現在若不事先設法加以制限，將來美國被迫牽入戰爭漩渦的可能性必比大戰時潛水艇為更大。

總之，美國目前對於軍事政策與國家安全的問題，無論政府當局，無論在野人士，都應該以坦白的、誠摯的態度去研究，去考慮，想出一個適宜和合理的辦法。凡事必須事先預備，切不可到臨時才抱佛脚！

斯大林與蘇聯的外交

李澤珍

本文節譯自六月十八日的法國新歐羅巴週刊 (L'Europe Nouvelle) 作者

為法國著名政論家摩里士·伯爾諾 (Maurice Bernot) 對於蘇聯與德國的關係頗有特殊的見解。

譯者

斯大林於本年一月十八日致共產黨青年伊凡諾夫 (Ivanov) 的信中有說：『應當使我們全國人民常在動員狀態之中，這樣，才好準備應付軍事侵略的危險，這樣，國外的敵人才不能出我們不意施行詭計襲擊我們。』這樣特別注重國防，同時又苦心維持甚至加緊蘇聯與西歐民治國家間現存的聯結，這雙方面的進行似乎是同一步驟的。故擴張軍備與恆久動員的政策，正好得李維諾夫 (Litvinov) 多講實

際，少談主義的外交相輔而行。

是不是國防與外交雙方合作的陣容在目前已不及數月前那樣穩固呢？世人發生這個疑問，原因是看見斯大林最近把那些會為李維諾夫所選派且與他的工作有密切關係的外交人員大批撤革了，而代以那些不大出名的新角色，他們對於國際政治的經驗一點也沒有。例如蘇聯新任駐德大使梅列卡托夫 (Mepokotov)，聞說在未做駐德大使館商務參贊之前，本是政治警察中人，對於電影問題特別有研究，他在柏林也許很活動，但向來並不為人所注目；如今竟是大使館的領袖工程師德列夫真斯基 (Derevianski) 被派為芬蘭公使；挪威、愛沙尼亞、利塔尼和立陶宛等國的公使官職則分別授與尼科諾夫 (Nikonov)，尼基丁 (Nikitine)，索托夫 (Sotow) 和卡拉匹汶次夫 (Krapiventsev)，他們都是一班不著名的公務員，年紀約在三十至四十歲，對於外交和政治都是門外漢。這些當選者沒有一個是李維諾夫提名的，或是經他同意的。此外，外交委員會內部的變動也有同樣的情形。難道所有這些特別事件不是屬於一個全盤的計劃，出乎一個總動機嗎？這恐怕說不過去吧。

自從革命直到最近期間，蘇聯的對外政策會經過兩個不同的局面。起初，歐戰勝利的列強扶助俄國的反動份子，使莫斯科政府受着四圍的威脅尋求逃脫孤立的危險，正好獲得德意志共和國為一臨時的同盟；因為有共同的仇敵，有壓制自己要求至相當限度的意志作成了

113940 互相聯絡的立場。這就是拉帕羅協定。

來。這種政策的主動者是齊哲靈 (Tentchev) 克拉辛 (Krasine) 拉科夫斯基 (Rakowski) 越飛 (Joffé) 克列斯廷斯基 (Krestinski) 除了齊哲靈都不是職業的外交家；可是他們有着豐富的經驗，曾在西方居住過，會說外國語，且熟悉歐洲的政治。專家如克拉辛習於處理大事，善於應付國際關係；具有十足的資格主持一個大使館。這些執行者與柏林外交家間的協商計畫，大都是消極的；抵抗西歐列強，反對凡爾賽條約，打倒國際聯盟。只有一條計畫是積極的，那就是依照列寧與託洛斯基所定的方針組織世界革命。所有這些都很和諧無間。因為破壞的工作與反抗的努力並不是不相容的。兩種方法雖不相同，然就目的而論，其實是殊途同歸。

希特勒登台劃出第二個局面的開始。德國領袖不特無意取消拉帕羅協定，而且關心於期滿重訂。不過無論對內對外，他却激烈地反對共產主義。雖然是這樣，德俄兩國陸軍參謀本部的聯絡還是可能的。在事實上這種聯絡繼續存在；但是兩國間的外交家卻再不能一致行動。莫斯科的外交家接近西歐民主治國家，和他們同意，交涉加入國際聯盟，德國卻反臉惡聲宣告退出。加之，經驗已經證明資本主義的國家還未到社會制度大改革的時候。因此蘇聯把世界革命的計劃束諸高閣，而以個別的和平與集體的安全來代替。這個政策的主要發起人是李維諾夫，他善於了解心理，而又足智多能。他到日內瓦不久，地位即很重要，

參與一切事務到處確定他的勢力。

蘇聯先與法蘭西簽訂盟約其後又與捷克簽訂盟約於蒙特婁會議 (la conférence de Montreux) 席上，蘇聯幫助土耳其收復對於達達尼爾海峽 (Dardanelles) 的完全自主權，同時為他自己在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獲得行動的自由。為維持俄羅斯在國外與歐羅巴接近的工作起見，必須有一班對於歐洲甚至世界的事務有經驗的外交家。李維諾夫努力搜羅與訓練這班外交家。他改組外交委員會的各級職員，並為他的政策培養外交人材。在未授與重要職位之前，他使這班官吏受着相當時間的試驗。布洛多甫斯基 (Brodovskii) 曾在各國公使館工作十一年，方才被派為利塔泥 (Letonie) 公使。札古波維尺 (Zakoubovitch) 在未出任挪威公使之前，曾在柏林大使館做過十年秘書或顧問；鮑格莫諾夫 (Bogomolov) 在未出使中國之前，也是同樣的。當由里尼夫 (Youriniev) 應召主持駐德使館之時，已在波蘭、波斯、日本經過長時期的學習。所有這些人都是經過選擇與訓練的，故能與各國職業的外交家相周旋。

今日的情形怎樣呢？李維諾夫所選派，或認定的職員只留下三個公使：馬斯基 (Marski) 駐英，斯泰因 (Stein) 駐意，蘇里次 (Souritz) 駐法；這三個職位確實是最重要的。但駐德大使與北歐各國公使素來在俄國外交系統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今日還是如此。何以最近卻有特別的變動呢？這些現任公使也許供給斯大林與共產黨一切保證，可

是世人不能奢望他們對於現在世界的情形有所建樹，他們將限制任務於做報告者或竟像世人所說的「信箱」嗎？這是不足應付今日的需要的。

最近發生的變化，也許由於蘇俄內政的關係，斯大林要「肅清」外交委員會的異己份子正如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他曾肅清軍隊一樣，（雖然所用的方法流血較少）最近政治密探的可疑份子亦就是這樣被肅清的。這種清黨肅軍的工作其目的不外把所有的權力更加集中在一個獨裁者的手裏。那些榮膺選任的人們會是沒有專門的學識，或缺乏創始的能力，而只知一味盲從上峯意旨的人物。假若是如此，則事情糟透了，但却是無可奈何的。

然而，還有另外一種解釋。斯大林也許以為李維諾夫的系统沒有使政府獲得他所期望的利益。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可是國聯正在破產。蘇聯接近了西歐民主治國家，但民主治國家僅與他訂立了原則上的協約，而沒有建立確切有效的合作基礎。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只有走向孤立，可恐怖的孤立，一方面倚靠獨裁，另一方面則增強軍備至國力可能的限度。但蘇聯國力可能的限度在那裏？他的原料與人工是極其豐富的。採行的經濟制度，把國內企業的費用差不多減到最賤的程度。至於供應對外的需要，他有許多黃金的儲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不是孤立政策的結果將要恢復侵略的共產主義，依照列寧、託洛斯基和齊

113941

諾維夫(Zinoviev)的計劃企圖世界革命呢？

東方雜誌

第三十五卷

第十七號

世界各國著名雜誌論文摘要

自從克雷蒙梭 (Clemenceau) 主張採取防疫的方法隔絕蘇聯以後，我們從未停止把蘇俄的孤立看作歐洲嚴重的危險。從前因受外力壓迫不得不孤立而生的一切麻煩，如今又復現於自願的孤立。此外還有一些別的麻煩，因為德國可怖的發展在歐洲已造成新的形勢。我們不倦地重複說：蘇聯與法蘭西和捷克盟約的存在，即為日耳曼東進政策最後的障礙。那僅是理論上的障礙嗎？這當然全靠有關國家使之變為更真實，更可怕。要是這些盟約沒有變更，則德國政策的推進終於要受着攔阻。須知德國對捷克的陰謀不僅在解放蘇台登日耳曼人，且要離開捷克與蘇俄，使捷克政府的對外政策仰德國的鼻息，而不再與蘇聯的相照應。這種政策既成功，則僅剩下破壞俄法關係這一着而已。

德國這種工作的完成將並不十分困難，假若蘇俄政府放棄李維諾夫的政策藉口於西歐國家故意讓這種政策「場台」而與他們脫離關係。蘇聯這樣孤立起來將不免受德國玩弄，因此這種孤立我們視為極其危險。這並非是空論。事實上，德國參謀本部和紅軍的參謀本部成立其認為需要的關係，從不感覺為難。將來有一天，為着支配歐洲，覺得和蘇聯成立同盟是合算的時候，希特勒亦必絕不遲疑。不過，這一天來到，歐洲、西方的文化，以及我們的自由恐怕都要完了。

西班牙農民在戰爭中

楊之春